

## 下面是 kindle 的笔记摘录（按书的顺序）

1、善于思索，勇于实践，你头脑中新的思想就会使世界变样。毫无疑问，这是个人主义，但这是为社会优化事业服务的个人主义。

2、为什么要逆着风大声朗诵唐诗？当然不只是练嗓子，更是为了在意志力同一切阻力进行的搏斗中获取乐趣。

3、毛泽东认为，组织者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够把各种人的长处结合起来。他不**应暴露别人的弱点，或者反复指责别人的弱点，而应当鼓励把所有积极的因素联合起来**。毛泽东的父亲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将会做到。

4、毛泽东严于律己。对待自己，也如同一把尖刀。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进行自我修炼的方法：他有一个习惯，带着书到距第一师范不远的一个叫南门的最喧闹的地方去看书，为的是检验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这是培养英雄的小小路径。如果说他还没有能力塑造他周围的世界，但他已能够塑造自己了。如果说毛泽东还没有一个胸有成竹的总体计划，但他现在已不是独自一人。在东山学堂时，他与众不同，但那是一种悲惨的孤立。到1918年，他仍然与众不同，但这种不同，成为他发挥影响力的优势。其他人随时会跟他走。他的怪癖举动变成他的策略。这位学生已经成为一个领袖人物。

5、北方是官僚传统的发源地。这里有很多官员和名流，他们认为苦力们除了出汗干活以外，头脑里不可能有什么思想。他们与在韶山的田里耕作的人们，如同隔世一般。

6、说到底，毛泽东之所以留在中国，是因为出国的意愿不够强烈。那些障碍之所以成为阻拦，是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他自己的，或许还有中国的，未来的关键在西方。他的思想集中在中国的传说、中国的壮美和中国近年来受到的屈辱上。

此外，既然蔡和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忙着在法国工厂里打工，那么毛泽东已成为新民学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7、毛泽东是那些不幸的月份里仍然担当国民党某项计划的负责人的唯一共产党人。

8、**每一场新的革命都是一次未加预演的创造性行动。基于别处的最新胜利而精心安排的计划，极少能够成功。**

9、走向革命的第一步，是让穷人意识到自己的贫穷。

10、毛泽东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把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枪杆子、农民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先锋。但是，在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方面，他是先锋。

11、战争是政治的一个分支，因此赢得人民的支持，对政治和战争都不可或缺。

12、毛泽东在需要灵活性和智谋的挑战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和两名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做了一笔交易，从而得到 600 个人和 120 支枪。他以游民和“二流子”充实部队。不到两年，刚开始发展壮大红军的大部分人就是这些被工人和农民都看不起的游民了。

13、**毛泽东在努力展示一支占领军（中国人民对此太熟悉了）跟一支与百姓有鱼水关系的军队之间的差别。**

14、但是中国的现实才是毛泽东毫不动摇的视角。在取得政权方面，莫斯科和上海也许有帮助，也许没帮助，但山区则是关键。

15、**毛泽东在走地方路线，但他心怀天下。**

16、毛泽东不大可能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救星。他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常常与党中央的观点不一致。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留在中共的组织中，毛泽东做出很多努力，并曾多次做出妥协。

16、斗争以整个形势为转移。绘制它的盛衰图不仅要靠自己力量的消长曲线，也要靠敌人力量的消长曲线。观点很简单，但很根本。

17、毛泽东胜利了，但是在胜利时他并不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关于处理内部矛盾的箴言：“治病救人”，处理了几百也许几千人。这一事件如果说使得毛泽东不像以前那么受爱戴的话，但却让他的地位较以前更稳固了。

18、中共取得政权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社会中的“人”的地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社会中的“如何”（人的行为规范）做，所以它又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19、毛泽东失去军事事务的控制权以后，就以学徒般的认真态度致力于基层的民间事务。

20、**毛泽东每次失权都没有止步不前，而是换个方向与思维继续前进**

21、关键是毛泽东缺乏反潮流而制胜的影响力，而当他知道不可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他随大流。他牺牲蔡廷锴，是为了守住他在江西政权中仍保有的一点权力。

22、中共领袖们只是在第一项任务上不吵架。这种不团结的破坏性的确太严重，所以长征还有第五项任务，虽没有明说但却至关重要，就是为中共建立新的领导机构。

23、但是，毛泽东也在部落之间的纷争中渔利。他使用的方法让人想起他在井冈山上对付土匪的手段，并预示了 7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力量均衡战术

24、共产主义中国的理想诞生于长征的血、汗和冰雪之中。他们激起新秩序后续建设者们的责任感。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25、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袖，并不单纯是依靠其组织技巧，也绝不是由于莫斯科的保佑，更不是因为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新的应用。他的崛起，是由于他专心致志和坚忍不拔，因为他把某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上的系统阐述是以后的事，是在毛泽东有时间通盘加以思考时候的事。

26、事情不是想清楚再干，是干的过程想清楚的

27、由于他不容忍任何反对他的“延安道路”的意见，所以他排除掉了中共日益扩展的组织结构中每一点非毛泽东主义的成分。

28、没有斯大林 20 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毛泽东仍然极为可能成为中共的领袖。但是，如果没有日本 30 年代对中国的进攻，毛泽东就不会在 1949 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29、有些中共领导人想把蒋介石无限期地关在监狱里，甚至作为叛徒公开审判。毛泽东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此时在此事上表现出宽宏大量，这将让他赢得作为爱国者压倒那位中国名义领袖的道德上的胜利。（注：西安事变）

30、蒋介石个人赢得了被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共因为释放他而使共产主义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31、毛泽东是个不是军人的军人，他懂得，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而社会给他们指派了角色。对八路军战士来说，奸淫就是在侮辱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的姐妹。通过在中国被剥夺者中组建八路军，并且使它知道为何而战，毛泽东让人民战争为他这一方的斗争服务。

32、他反复提到他 1927 年第一次使用的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并不意味着军事事务控制政治事务。相反，毛泽东相信，一支队伍的工作如果没有中心目标就毫无意义。但是，毛泽东在 30 年代已经知道，在中国落后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必须有他们自己的军队，以赢得政治行动的独立

33、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1940 年末从莫斯科的学校里写信给他们的父亲，报告他们的学习情况。“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毛泽东在 1941 年 1 月的回信中说，“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34、史沫特莱跟斯诺（他最初觉得毛泽东很“怪异”[5]）一样，很快就认识到关键的一点：毛泽东不再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可能一眼就做出判断。他正在变成一个圣人。而圣人，可以是深奥莫测的，而且可以放纵自己。

35、在毛泽东身上，正在形成一种帝王式的气象。他感觉中国历史的重任已落在自己肩上，这就是为什么他已失去了从前的一些自然的东西。而他自负的特质，则变得越来越强烈。

36、毛泽东的情况，更多的是一个圣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时代的壮丽场景中的位置，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正在办公室里发福并放纵自己。毛泽东没有变得喜欢奢侈，但他仍然是天不怕地不怕。

37、在延安时期之前，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只有很小一点权力。进入 50 年代，他有了权力，但是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庞大官僚机器，会让他作为导师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有力。而延安令人兴奋之处在于，他既当导师，又是统治者。这使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作为中共首脑的黄金时代

38、土地政策是关键。与国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双方同意，没收土地就停止了。地租保持较低水平（红色政权接手以前，地租高达土地价值的百分之六十），但还是有保证的。这种做法证明对经济和士气都有刺激作用。

39、这位湖南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所进行的游历，再加上他有勇气坚信他的亲眼所见，使他相信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骨干。

40、在农民的窑洞里，毛泽东离这个微型的五四运动很远。但是他的方法一直是驾驭，而不是直接加入到这样的知识先锋的行动中去。1919 年，当建立新世界的声浪升起时，毛泽东正在孔子诞生地默想。1935 年，当抗日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时，他远在延安。这次的情况也一样。

41、“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关于失掉延安的事时，他告诉她说，“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懂得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打仗的社会意义：你赢得了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你就赢得了胜利；而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7〕

42、**蒋介石只是在对付相继而来的每一个危机的范围内表现出精明，他没有宽广的视野。毛泽东是以一个研究过历史的人的长远眼光看问题。蒋介石是个爱虚荣的人，常常因为事情的细枝末节而转移注意力。毛泽东（在 40 年代）是个直截了当的人，只对他的目标的本体感兴趣。**

43、毛泽东自己对军队的看法不一样。从根本上说，它是动员起来的人民，既不是一种机械装置，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模式而已

44、更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在中国内部的影响是，促进了阶级斗争而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不恰当的地位

45、他和梁漱溟较量是因为他想要俘获梁漱溟的灵魂，以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证据。

46、**在他之前的中国圣人们寻求大同世界，毛泽东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他把真理和权力融合在一起。**

47、毛泽东把政和教融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这更糟糕——由于他深切地相信，两者应当融合。

48、对毛泽东来说，支持多元性就是支持 6 亿个人的自私自利

49、“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可能成为私人价值观的汇聚之地，这违反毛泽东要把一切私人价值观都纳入大同世界的努力。

50、**在这个主要依靠社会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几乎从来没有很强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北京把人民用各种规章制度捆绑起来，自 2200 年前秦始皇这样做以来几乎没人这样做**

51、毛泽东知道很多关于外部世界的事。他坚持读书。20 世纪中期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甚至包括戴高乐——像毛泽东那样自己读书并写出自己的发言稿。历史和地理是他外国知识的两根支柱。科学技术问题以及政党的更替，他并不很感兴趣。

52、毛泽东比斯大林的政治手法更温和、更有耐心，但是从根本上讲，大概并不那么有妥协性。他的教师气质甚至在他掌权时也从未消失。

53、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冲突，但是仍然在中共监护的框架之内；在公民中唤起辩论，然而目标是事先已确定的。

54、在 1945 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105 次。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只提到 4 次。“集体领导”的提法，从不离刘少奇的嘴。他说，中国基本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现在的工作就是经济建设；他试图以此压一压毛泽东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他坦率地说出了很多经济计划者会很乐意让大家知道的话：“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55、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赌时间。他的目的是把中国建设得至少跟苏联与美国一样强大。在那时之前——当然还很远——绝对重要的是，他要阻止苏联和美国以任何形式的联盟串通一气来对付中国

56、1958 年对毛泽东来说，在 1956 年就开始了。“百花齐放”的号召令毛泽东失望，知识分子拆了他的台。他现在只信任未受过教育的基层老百姓的能量。



57、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在后来的 10 年里，毛泽东用它四个方面的影响治理中国。一切都不能只看表面；不断的变动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未来并非在“远处”，而是必须现在就把它抓住；混乱是大多数美好事物的催化剂。

58、如果说毛泽东对最终目标有怀疑，那么他对如何去做，却有强烈的信心。他觉得经验已经教会他政治行动的秘密。 ●利用矛盾是获取和掌握权力的方法。 ●平衡只是假象，甚为不利，不平衡才是最有创造性的事物的状态。 ●进步靠“波浪式”推进来实现。 ●如果变革只有上面的命令，而没有群众热情投身于变革运动的积极性，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斗争保持纯洁，它不仅能让你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是政治中的神圣的东西。 ●可信赖的人不是专家，而是老粗、外行、卑贱者或所有那些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

59、这只是自我打气。毛泽东会说某项任务要在两年内完成，要不然就四年，或者如果还不成就五年。数字起着鞭子的作用，而不是经过认真计算的结果。

60、毛泽东不喜欢任何种类的专家，“大跃进”是对非专业观念的庆祝。

61、在摸索一条符合中国之“道”的道路时，毛泽东重新开始做他在延安停下的事。中间插进来的一些妥协——与国内同盟者的妥协是为了赢得政权，与苏联的妥协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援助——他在“大跃进”中通通都置诸身后了。

62、在批评苏联经济学的过程中，毛泽东向儒学迈了一大步，从而离开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

63、“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他衷心地确信中共的分裂是一件好事：“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分裂现象。”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没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毛泽东所用的比喻，让人觉得分裂是新生的自然方式。“这不过是新陈代谢！”他告诉代表们说。“就像细胞的死亡一样，每年、每月都存在分裂。”他好像很喜欢“分裂”这个词。毛泽东关于分裂是健康现象的这种信念，即将付诸可怕的试验。

64、每一代人都必须找到使自己兴奋的东西，1958 年，毛泽东为千百万的年轻农民提供了一些这种东西。地方的积极主动性被激发出来，群体精神加强了，普通人觉得自己的中国精神得到新生。农村政府的新框架——把劳动与公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诞生了。

65、“大跃进”最初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因为 6 亿人以让人印象深刻的忠诚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这是中国农民最后一次这样做。

66、不知是赌气，还是在同事的压力下，抑或是为了以退为进而用的计策，毛泽东于 1959 年中，让位给刘少奇做国家主席，同时保留中共中央主席这个最高职务。

67、**毛泽东能在一句话里既表忏悔又表反抗。**“谁要是说这么一个大的社会运动不会发生任何偏差，”他宣布说，“谁就是空想家、观潮派、算账派，或者就是反对派。”这是狂野的、横扫一切的、挑衅性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毛泽东。他痛恨算账派，他们使他想起他的父亲。他蔑视那些害怕下一次浪潮会到来的人。他对反对派的影子过于敏感。

68、在韶山，陪同毛泽东的是当地一位热情的年轻干部，充满对“大跃进”的赞扬。他看上去像一个朴实的童子军领队，当时正担任毛泽东家乡所在地湘潭的地委书记。毛泽东喜欢上了他，就好像是在他与同一代人的政治局成员痛苦而紧张的关系中，伸手抓住一只年轻的手一样。这位年轻干部的名字叫华国锋，我们以后会更多地听到他的事。

69、他在承认错误时，对词语的选择颇为巧妙。“说要快，”他说，“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而且说：“我见过列宁的手稿，里面改得一塌糊涂。他也犯过错误。”

70、“你解放军不跟我走，”他转向在场的部队高级领导人说，“我就找红军去，一切从头开始。”许多人心绪难平。当他猛烈地抨击说他要“回到井冈山”时，一些人肯定会回想起他1938年的威胁，说如果对江青的攻击不停止，他就要“回韶山”。

71、跟彭德怀的斗争比1954年高岗事件更严重。高岗不过是个阴谋家，彭德怀则在根本政策上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高岗认为毛泽东的个人统治走得太远，而彭德怀类似的观点对毛泽东则是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当时斯大林已由于这方面的错误而被拉下神坛。高岗惹得差不多全体政治局成员都反对他。而在“大跃进”问题上，陈毅和朱德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刘少奇中立，政治局里几乎没有人完全认同毛泽东的意见。

72、外部危机对“大跃进”之火而言是燃料。“除了其不利方面，”毛泽东在同一场合说，“危机的局面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阶层和中间派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73、“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他有一天下午一边喝茶一边问赫鲁晓夫。“可多啦，”他自问自答，“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究竟要表达什么的疑问并没有持续多久。“想一想，”毛泽东继续说，“你们有两亿人，我们有七亿人。”

74、因此，毛泽东的防御观——拖拉机加原子弹——是他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条格言的符合逻辑的结论。如果有人攻击中国，他会诱敌深入，包围之，然后以经过检验的对付日本的方式猛扑上去

75、正如毛泽东觉得一切好的东西都受到其对立面的限制一样，春天也受到限制。梅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刚正高洁的象征，它独自开在冰雪覆盖的悬崖上。这里毛泽东是在形容中国在苏联阵营内的孤立，或许还有他自己在中国的孤立。

76、他的新思想像一团怪异但不致命的烟雾在北京上空盘旋。正如毛泽东自己注意到的那样，他认为阶级斗争仍然很激烈，这让同事们非常吃惊。但是，只要这种看法仍停留在语言上，他们就可以容忍

77、他担心 1949 年后出生的 3 亿年轻人太软弱，必须让他们经历自己的斗争

78、“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波，是针对那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大厦看作目的本身的官员们

79、罗瑞卿之所以遭到清洗，是因为他坚持的立场是：尊敬苏联，对社会主义集团有信心，制定方针以欧洲为中心，在越南战争上采取鹰派姿态。林彪的立场则与此大相径庭，他的路线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 60 年代对世界的看法。

80、这一博弈也源自 1956—1957 年的冲击。那个时候，毛泽东失去了对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信仰。此后，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真理和党的权威完全是可以分离的。他的这种观念非常强烈，以至到 1966 年，毛泽东相信真理可以脱离党的权威而建立起来

81、红卫兵们在造反中找到快乐，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他们是失落的一代，突然之间意识到被别人发现了。他们上了中学，但是在那里被唤起的期望不可能实现。大学里的位置或城市里的工作岗位对他们来说都太虚无缥缈了。从来没有机会无拘无束的一代人，现在终于可以发泄了。这些中学生，即使与真正的资本家面对面也未必能认出来，却指控与资本主义斗争了几十年的老革命们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82、个人崇拜在他看来，在一个落后的社会中是必要的，即使这个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体制下。还因为，林彪为了自己的目的正在推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缺乏精力和缺乏意愿两者加在一起，又使毛泽东对此听之任之。

83、而他心中的社会主义，是永恒的斗争，他看到的现实，是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

84、毛泽东并不打算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希望把中国青年发动起来并锻炼他们，而不是要跟他们分享国家政权。因此，“夺权”是个误导的口号。清洗一些“右倾”分子是没错的，但并非是另搞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85、他不能在自己对斗争的信念与意识到的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他相信斗争对锻炼性格（一个个人的问题）有好处，同时又意识到上千万的人互相斗争将产生混乱（一个政治秩序的问题）。

86、毛泽东跟林彪不同，他并不把不计一切代价保卫政权大厦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他也不像林彪那样倾向于使用军事权威的盖子来窒息政治上的观点分歧。



87、毛泽东无情地剥掉了俄国熊脸上的马克思主义假面具；但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为后来的一种观点树立先例：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浓厚的民族主义涂抹得难以辨认。

88、毛泽东正处于一种演变的边缘，即放弃阶级分析，而把势力均衡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关键。

89、**他坚持一系列的价值观：变化的永恒性、斗争的无所不在、大规模军事设施的祸福兼有、空间本身的无用性。**

90、然而，周恩来不得不谨慎对待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接二连三地对高级同事产生不满。他小心地不对武断的、过度敏感的、晚年的毛泽东提出异议。

91、邓小平的回归是毛泽东不得不为回报帮他打倒林彪的联盟而开出的又一张支票。毛泽东曾依靠军区的司令员们，这些倔强的老兵大部分是邓小平的好朋友。

92、然而，邓小平复出所面临的局势并不是简单的“左”对抗“右”的形势。毛泽东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他时不时显示他的权力的那种不可预测性、他那堂·吉珂德式的对真理的跳跃式追求，使无论来自哪个方面的精心做好的计划都具有了不确定性

93、毛泽东看来像是不能或者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层次排列成前后一致的模式的人

94、毛泽东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在即将召开的党和人大的会议期间离开。他在等待时机，脚踏着两只船，把他更可怕的怀疑掩藏起来，暂时让形势自然发展，不予干涉。

95、然而，从其民族主义和长期愿景的意义上看，毛泽东的战略前后是一致的。他不希望苏联和美国互相打起来，但他也不希望它们勾结起来对付中国。**他希望他们相互之间不信任，从而让中国争取时间变得强大起来，成为可以与他们之一或二者相匹敌的对手。**

96、到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的喊叫，好像滔滔不绝地喊叫，就能把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场灾难的内心感受清除得一干二净。这种气氛是由自我陶醉的活跃分子制造出来的，正像毛泽东鼓励他们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97、他一直在寻求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希望除掉那些已经背离毛泽东主义路线的同事。一种新的心态，在60年代的确控制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敬畏削弱了。一种新的政治方法的确显现出来；对草根们的动员，导致过去消极而忧郁

的千百万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了政治。毛泽东在高层的敌人被搬掉了，一半的政治局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倒台了。然而，这些变化都没有持续下来。到了70年代，年轻人的兴奋被相当普遍的玩世不恭所代替。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又回来执政（邓小平是其中的代表）。如果说对权威的敬畏减弱并延续了下来，那它现在正转变成对共产党的怀疑。

98、总之，1976年初周恩来的逝世导致了两派分化。单是毛泽东的存在（加上他变幻不定的偏爱）就已事先为反邓赌博的色子做了手脚。

99、毛泽东至少可以信任他——在非常缺乏信任的被毒化的气氛下，这是华国锋极大的优势。华国锋1969年才从湖南来到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比久经战阵的邓小平的敌人要少。在一些关键性的政策问题上，他站在邓小平和极左分子之间。在当时普遍头脑发热的情势下，他是冷静的。

100、然而，山西出生的华国锋主要的资本，就是他为毛泽东所做过的事，再加上毛泽东不喜欢别的候选人。他在毛泽东的家乡搞了灌溉工程；监督建造了无疑是谄媚奉承之作的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他在毛的授权下，修建了一条连接该地区和长沙的铁路（这对这个小村子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好运），并在韶山建了一座彩色电视机厂，把有吸引力的职务给了毛泽东的许多远亲；更有实质意义的是，他向林彪投掷了政治石块。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他选择了一个二流人物，而不是最好的备选人来代替周恩来。他知道有人说华国锋“蠢”，是个“土包子”（很可能是他疏远的妻子说的）。他反驳说，他发现华国锋“无私、不蠢、厚重少文”

101、毛泽东心里的某个魔鬼希望斗争继续下去，即使其目标只是幻象。“搞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华国锋被提升后不久的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宣告中写道，“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最典型的毛泽东，一个仍在探索而不相信平衡的人，一个在倾慕光明的同时常常提醒人们还存在黑暗的人。**

102、**毛泽东是一个导师；他的确希望他的学生，即中国人民，自己头脑要清醒。但只能有一个头脑，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思想不一致是不道德的。这就是进行说教的毛泽东和挥舞权力的毛泽东之间不幸的一环。

103、批孔”运动的一部分灾难性后果在于，已经从“长剧”里删掉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不管是儒家的还是毛泽东的。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国家的经济未来，优先于长期累积下来的信条的荣耀，孔夫子和毛泽东之间的争斗，在他们看来是书呆子之间的事。

104、**“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意味着一个集体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兴趣各异、观点多样的一群公民。**

105、因毛泽东生命垂危，又因为没有正常的转交权力的程序能让他自然地把权力交给大家商定的继承人手中，毛受到奉承者的摆布。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国到访者并不意味着他已退出政坛。近水楼台、枪杆子、个人忠诚、血缘关系变得比宪法或任何其他的规定都更重要。

106、无论 1949 年以来路线上的所有左倾右摆有多么吓人或有风险，毛泽东的存在一直是个不变的因素，是权威的最终源泉，是任何动荡的一个底线。那个时代即将结束。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里，还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隐隐显现的断层的先例。

107、**外电总是说毛泽东去世后将带来不确定性。然而，毛泽东的存在长时间以来成为中国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而他辞世的时间，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